

回應與反響

黃應貴 Ying-kuei Huang

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教授

對於趙彥寧及夏傳位兩位教授的書評，筆者僅就作為主編之一及導論二作者的身分來回應，並進一步說明。其他則由相關作者來回應了。

有關趙彥寧教授〈生命治理：人類學研究的可能貢獻〉（趙彥寧 2020）一文的評論中所提到三個有關研究課題值得進一步探討，以彌補本書之不足，並可避免過分使用「新自由主義」解釋之嫌。這三個課題是：1.家庭價值如何成為勾連新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的關鍵節點。2.民粹主義（populism）和技術官僚主義之間的競合關係。3.新自由主義時代的日常生活和集體政治實踐與動員，往往與網際網路等新科技的崛起直接相關。在某個程度上筆者都能接受這些建議。事實上，在一本具有她所說的「拋磚引玉」的論文集，要涵蓋所有主要研究的主題，本來就是不可能的事，而是希望引發其他相關研究課題的回應與討論。雖然如此，筆者在導論二的立場是更強調我們若沒有從認識論及本體論去反省探討的現象本身及提問的方式，很可能因無法跳出自啟蒙運動以來現代性知識之限制而難以掌握在當代正在發生的新現象及新問題，也就更難去尋求解決之道。就如作者提到筆者所編的《21 世紀的家：臺灣的家何去何從？》（黃應貴 2014）的導論中，就是說明核心家庭的形式與觀念並不是普世性的價值，而是特定歷史發展的產物，而在西方，它的普遍化更是工業革命下的產物。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去面對新時代對於家的新想像與新問題，進而尋求解決之道。

同樣的立場也可用來回應夏傳位教授〈如果到處都是政治，那國家是否消融了？〉（夏傳位 2020）一文的評論。夏文有兩個主要意見。第一是認為「沒有在兩位主編之間的重大差異尋求有意義的對話，甚至進一步探討此一差異對新自由主義政治的意涵為何，實屬可惜」。確實也是，我們就是差異太大而無法整合，才以兩篇分開寫的導論之方式出版，希望這種做法可以讓讀者有更大的空間去思考。事實上，這差別不只是夏文所提及的不同，更涉及我們對於新自由主義國家與政治及權力的想像本來就不

同，並涉及我們對於未來知識發展與社會文化走向及解決之道的不同想像，這基本上就不可能在一篇有關政治的文章內釐清，就如同夏文有意或無意省略筆者在導論二結論中所談的本體論的轉向問題一樣，那將會是另一個更棘手、更難釐清的大問題。

夏文第二個意見是「我們都過於低估傳統國家理論的效力」。夏文這方面的討論，正如國家研究傳統者一樣，一開始就假定「現代民族國家」是個本質性存在的實體，是不變的自變數，它有它的能動性與自主性。只要它在歷史中形成，就具有物一般的特徵。但筆者在導論二中，一開始就指出現代民族國家基本上如核心家庭一樣，是特殊時代的歷史產物。以英國這個老牌的現代民族國家為例，它從十六世紀開始，經歷了三個世紀的發展才完成它現在的面貌。更重要的是它的形成與發展，是與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相輔相成，就如同貨幣之兩面。但當資本主義本身有了新自由主義化的發展時，現代民族國家是否已有一些根本的改變？夏文類似國家研究的傳統者一樣，往往是從制度的角度著手，既然形式上的主要政治制度沒有什麼改變，就很容易下定論國家依然屹立不搖。但真的是如此嗎？我們如果回到人存在的本身而不是只談沒有血肉的制度，恐怕就不是那麼一回事了。筆者舉兩個實際的例子。

筆者有位高中同學，在 1970 年代，當臺灣的紡織業開始沒落之時，便蒐集被放棄的產品及生產機器，到中南美洲發展，結果在該地成了非常成功的企業家，可以上通總統，故陳水扁總統要訪問中南美洲時，便透過他成功地中間牽線，完成訪問的行程。他也因此與政府有了密切關係，便回臺發展，並成為某個財團的董事長，壟斷西部到東部的旅遊事業。為此，他不僅透過政府改變保留地的地目而在卑南族的聖山都蘭山買下二十甲地，預備籌建遊樂園區，以此為其事業的總部。並以同樣的手法買下司馬庫斯對面的鎮西堡附近二十甲地，以便未來規劃建立高山纜車直達司馬庫斯觀光遊覽區。而為了發展東部觀光，他更大量提供政治獻金給支持開闢蘇花改的民意代表，敦促其通過及完成等等。筆者可以說這位董事長及其背後的財團是透過國家機器來發展他們的企業，許多相關而有爭議的國家政策之決定，背後都可以看到這個財團及這位董事長的影子。

同樣，筆者所研究的東埔社布農人，大部分的人都會告訴你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的高空纜車背後的財團，為了控制日月潭及阿里山兩個遊覽熱門景點，便遊說政府將日月潭國家風景區擴大到東埔社的沙里仙舊社，將此地開闢成森林遊樂區，以便建高山纜車，直接銜接阿里山國家風景區。為此，這財團已說服政府將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範圍由南投縣魚池鄉擴大到集集鎮、水里鄉、以及信義鄉。因此當地居民常會質問到底

是政府在做國土規劃還是財團？更讓當地人對於國家的想像改變的是在陳水扁總統任內推動的四化政策（去任務化、地方化、行政法人化、委外化）後，使得原本屬山地管制區的信義鄉，去除了信義鄉前屬於內政部警政署的入山管制站，重建了一個大型的 7-ELEVEN 店鋪外，當地人日常生活中有關的電費、罰金、停車費、乃至於稅金等等，都由此 7-ELEVEN 店鋪所代收，因此當地布農人便常說這是個「財團治國的時代」。

由上述兩個回到人本身的實際例子時，我們雖仍可以聲稱國家既有的制度依舊，但主宰國家政策之決定的力量，已不是代表人民或社會的聲音，而是財團與資本家。國家早已放棄過去國家理論常強調國家是在調解經濟力量（特別是財團與資本家）與一般平民百姓（特別是勞工）間利益的衝突，甚至主要的工作變成是在建立有利於財團與資本家的發展環境，包括市場的有效運作及資金的充分流通等條件，使得市場真言化成了普遍而具有主宰性的現象與機制。當然，夏教授還是有可能會爭辯說國家依然存在的事實外，社會中心觀點的國家研究可以彌補其不足。但是由「新世紀的社會與文化」已出版的叢書之研究結果，我們可以看到個人在新自由主義的政經條件下，早已從既有的社會組織（包括國家）中解放出來，使得個人的存在先於群體的存在，也使得多元成家、個人化宗教、社群性（sociality）、社會想像、族群性（ethnicity）、多重人觀與自我等等概念的出現與取代，就是要試圖以人（特別是個人）的主體性及日常生活出發，重新理解當代相關的制度及社會文化現象與過去的根本差別，甚至尋求可取代的觀念與制度之可能性，以解決新自由主義化下的當代困境，特別是貧富的極端化（這在極權國家的嚴重性絕不亞於民主自由國家）。但在我們還沒有找到或創造出新的「制度」或新的「政體」前，國家的制度性研究依然有某種的效果與意義。這點，筆者跟林開世都沒有否認，但已明顯不足，更缺少創新的可能性。因此，筆者在結論時說「國家也許不會消失，但它再也不是過去大家所熟悉的國家，而是一種新的人群組合及運作方式。同樣，權力不再只是功利主義式及傅柯式的權力，政治也不再只是公共領域或社會秩序的事，而是在自然力量的眷顧下，外在政治經濟結構力量與個人內心深處之關懷彼此結合運作的結果」。

不過，若想要找到新的可能，恐怕已經不是現代性知識所能解決的，而涉及了認識論及本體論的問題。也在這點上，筆者在結論中去討論「本體論轉向(ontological turn)」的問題。如果我們繼續拘泥在啟蒙運動以來的現代性知識系統與概念，勢必落入這知識的基本假定之前題上的限制而難有創新。譬如，在現代性知識中一個重要的假

定是人與自然的對立或文化與自然的對立，因此「人定勝天」成了文明進化的動力，但如此我們又付出怎樣的代價？人真的能勝天嗎？這些年來經濟成長的代價往往是砍伐森林、土壤流失、乾燥化(desiccation)、氣候變遷、流行疾病、以及旱災及饑荒等等。這其實也是在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殖民國家在殖民地從事熱帶栽培業的結果，迫使所有殖民國及被殖民地不得不聯手一起來面對，因而有我們現在大家都很熟悉的環境主義之出現。遺憾的是人類似乎永遠無法從過去歷史中得到教訓。此次 COVID-19（武漢肺炎）全球性的大流行便是一個最好的例子。雖然，國家在防止疫情的擴散及經濟救濟上，每個國家都因其制度及歷史經驗的不同而不同，效果也不同，國家中心觀者就會說國家還是最重要的，最後還是要依賴國家。但遺憾的是病毒是沒有國界的，一個國家也不可能因其防疫及經濟救濟上成功就可以恢復正常生活，只要全世界的疫情沒有得到有效控制，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置身事外。更何況這發展是否會導致某些國家的崩解，還有待觀察。最後，人還是必須學會如何與 COVID-19 共生而成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而由亞馬遜地區的研究所發展出來的本體論轉向，就是要尋求一個超越人與非人區分的新知識系統。雖然這轉向還在發展中，目前還無法說這方向是一定有效，但也只有在知識上的新突破才可能帶來未來的可能性與希望。而創新不正是學術研究得以發展的核心動力？否則，正如夏文一開始所說的，這是個急遽變動與混亂的時代。但若沒有對已有知識的反省與自覺，很可能就會落入 Karl Polanyi 在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Polanyi 2001) 一書中所說的，後人雖都知道工業資本主義社會在西方是在十八世紀下半葉成形，但當時的英國人一直到 1834 年廢止救濟不幸者的 Speenhamland 法案，逼使那些生活艱苦的窮人，成為工人。至此，工人階級正式成形，工業資本主義社會才得到社會大眾的認可，但也造成階級利益的衝突成了難以解決的社會問題。反之，傅柯因發現了那看不見又無所不在的權力，其實才是工業資本主義社會有效治理的力量與機制，故他稱資本主義社會為規訓社會，也挑戰了傳統國家研究者的一些基本假定，而使國家與政治研究有了新的可能外，也提供我們面對新世紀國家的新問題，使他被視為二十一世紀的學者，雖然他在 1984 年就已經過世。學術研究固然講究證據與累積，但更需要有創意與創新。

參考書目

夏傳位

- 2020 〈如果到處都是政治，那國家是否消融了？〉。《考古人類學刊》92：139-144。doi: 10.6152/jaa.202006_(92).0007

黃應貴

- 2014 〈導論〉。刊於《21世紀的家：臺灣的家何去何從？》。黃應貴主編，頁1-58。
新北市：群學。

趙彥寧

- 2020 〈生命治理：人類學研究的可能貢獻〉。《考古人類學刊》92：133-138。doi: 10.6152/jaa.202006_(92).0006

Polanyi, Karl

- 2001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